

师大附中中共地下党斗争片断^①

刘正洪顾毅然 温景崑等^②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前身为“五城学堂”，成立于1901年11月2日，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国立中学之一。师大附中历史上曾首创男女合校（1921年），实行高、初中“三三制”新学制（1922年），有一批专业水平较高的优秀教师，有科学和严谨的优良校风，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比较优秀。

师大附中有两个优良传统，一个是出人才。九十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各方面的人才，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汪德昭、马大猷、张维、陈遵妫、张钰哲等，有声望的艺术家李德伦、于是之、播音艺术家齐越（原名齐斌濡）等。另一个是有革命的传统。如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赵世炎，1919年在校学习时品学兼优，是学生会干事长，率领同学热情、勇敢地投入“五四”运动。30年代时，张承先在校学习，曾积极组织同学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时期，日伪统治着师大附中（男女校已分开），他们严格控制学生思想，推行奴化教育，鼓吹做“顺民”。经过中共地下党的教育影响，有的同学不甘心当亡国奴，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参加了地下党，有的奔赴解放区参加抗日战争。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统治时期，校方立即换马，从换上的校长李滋九到训导主任肖佩荪（解放后被镇压）以及直接监视学生的

训导员等基本上都是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他们要求学生服从国民党的“正统”统治，学习《三民主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宣传反苏反共，禁止学生参加反美反蒋学生运动，宣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企图使学生不关心时局，不过问政治。同时，还给学生以沉重的压力，使学生钻进书本无暇他顾。但在中共北平“学委”领导下，师大附中成立了地下党支部。他们发展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同学参加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并胜利地迎接了北平的解放。

一、播下革命火种，发展革命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极其残酷的统治，激发起沦陷区青年们的民族仇恨。“要抗日，不当亡国奴”成为当时有爱国心的青年学生的普遍思想，这也是当时他们易于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进而参加革命，从事党的地下斗争的思想基础。

1943年初，初三学生刘正洪（原名刘兰瑞）与同班同学胡鸿昌沟通了抗日思想，他们与邻居好友穆青（原名马建卿，辅仁中学学生）组织了“中青读书会”，以穆家做为活动地点。穆青又介绍他的表哥石甦参加了读书会，石甦是城工部领导下开辟北平城市工作的地下党员，由于他的教育和领导，使刘正洪和穆青等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要抗日就必须接受中共的领导。就这样，“中青读书会”由石甦实行单线领导。日本投降前后，经刘正洪发展读书会的成员中入党的有：新华中学的韩世芳，志成中学的鲁敏生，西北中学的彭年，师大女附中的赵玮、李雪琴等。

师大附中地下党恢复活动是 1944 年初刘正洪接受地下党领导而开始的。1945 年 8 月，地下党批准刘正洪为中共党员。1946 年 7 月刘正洪又将要求进步的同班同学何国模发展为党员。

1945 年秋进入师大附中读高一的一些学生，通过校外的亲属、邻居、老同学等各种社会关系，接受了地下党的影响和教育，走向进步。如胡德喜等因去过解放区、受到了革命教育而后来入了党。顾毅然受到从解放区回来的姐姐何钊和同学关毓琪（日本投降前夕从解放区回来）的教育影响，使他懂得了抗日救国要靠中国共产党的道理，经过一段革命斗争锻炼，顾毅然于 1946 年 2 月入党。他入党后，开始时是由崔月犁单线领导，当他的交通员，传送党的文件。1946 年七八月份先后转由杨伯箴、黎光领导。顾毅然成为师大附中地下党活动的另外一条线。

二、师大附中地下党支部的建立和 党的外围组织“民联”简况

（一）建立地下党支部。

1946 年暑假，薛成业（化名李青）通知刘正洪成立师大附中地下党支部。这届支部由刘正洪、何国模组成，刘正洪任书记，每次在何国模家开支委会，薛成业都亲自参加。支部成立后在校内积极开展社团活动，团结了一批进步同学，从中发展了三名党的外围关系（王学孟、胡德彝、梁景弢等），还将在社团活动中表现积极经过考察的女附中的石育英、董琦发展入党。以后，又将组织上转来高二年级的地下党员胡德喜，交由何国模单线领导，后因革命斗争需要，又将胡德喜输送到解

放区。

1947年夏，刘正洪等毕业离校。1948年由顾毅然、周长华（高三班）、罗三都（高一班）组成第二届师大附中地下党支部，顾毅然任党支部书记。这届支部积极响应和参加全市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大力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民联”，为迎接北平解放的护校斗争准备了力量。

1948年9月至1949年2月北平解放，师大附中这一期间在校的地下党员情况是：学生中有罗三都（高二班）、薛克宗（高一班），临近解放前夕，教师中有从校外转来地下党关系的吴鸿迈（数学教师）、张建庭（国文教师），但是他们之间也没有横的关系，直至北平解放师生间党的关系才汇合。

中共北平“学委”直接领导过的师大附中地下党支部和党员先后有：石甦、洪良、杨伯箴、黎光、薛成业等。

（二）党的外围组织“民联”的建立和发展。

1947年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联”）正式成立，顾毅然发展了曹祺（原名曹行睦）和李春山，罗三都发展了王志澄（1948年7月）加入“民联”。1947年秋，初中还有“民联”盟员肖俊林、赵明勇、高奉仁、薛克宗等，他们与高中的“民联”组织没有横的关系。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师大附中的“民联”队伍也不断扩大，1948年9月薛克宗发展温景崑、刘炳树等人加入“民联”。随着解放军围城的隆隆炮声，地下党领导的“民联”在师大附中已像滚雪球似的发展壮大。学校除了初一年级的三个班学生年岁太小与高中三年级有一个班没有“民联”盟员外，全校其余13个班都有了“民联”的盟员。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全校“民联”盟员已发展到39人。师大附中教师中的两名地下党员吴鸿迈、张建庭还在教师中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人民教育工

作者联盟”（简称“人教联”），发展了国文教师高向夫、英语教师刘祝三、体育教师张汝汉等。

此时，师大附中已经组成了一支由地下党领导的，以“民联”、“人教联”盟员总人数将近 50 人为核心的进步力量，他们在迎接北平解放的护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解放战争时期师大附中地下党的活动

（一）师大附中地下党支部建立前的活动。

1. 配合八路军接管北平的宣传活动。

日本宣布投降后，八路军已推进到北平西郊温泉中学一带，准备接管北平。上级布置刘正洪带领师大女附中的赵玮、李雪琴为一个小组，负责从“高岛屋”（即现在的西单商场）至宣武门马路两侧，张贴和散发北平卫戍司令郭天民的入城布告。顾毅然当时是与北大的地下党员在北海附近张贴和向住户散发，这都是在地下党统一部署的时间内进行的。第二天，北平市民在街道上看到了八路军的布告，奔走相告。这一任务虽然完成了，但上级组织几天后通知停止这一行动。上级指示我军进城的时机还不成熟，要求地下党的活动必须继续隐蔽，不准暴露，要做长期斗争的打算，要有不怕牺牲的决心，更要坚持做好秘密工作，发展组织，积蓄力量，为迎接革命的胜利做准备。

2. 参加反甄审斗争。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宣布沦陷区的学生是受“奴化教育”的学生，过去的学籍一律不予承认，对学生要进行“甄审”，重新进行考试。这一措施激起了北平广大学生的极大愤慨。这是国民党的阴谋，他们目的是要强迫学生效忠国

民党，效忠“三民主义”。他们以此分化学生，排斥进步学生。地下党通知，一定要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刘正洪遂把组织上提供的揭露国民党阴谋的印刷品，利用放学后校内同学离校的时间，张贴在学校布告栏和散发到高中班教室学生的课桌内。次日上午，校内师生见到这些印刷品反应强烈。校当局受到极大震动，训导处主任肖佩荪（原是数学教员，国民党特务，后任国民党涿县党部书记，解放后被镇压）与训导员黄培圃、杨君博气急败坏地将这些印刷品从布告栏撕下，并从各教室搜寻没收了这些印刷品，同时，还召集一些班长和少数学生代表追查印刷品的来源。

原来刘正洪张贴和散发印刷品时，以为校内已净校无人了，不知道另一班同学胡某也在校。胡某与张某都是三青团员，在学校追查的当天下午，张某突然向刘正洪恫吓说：“有人说你是共产党”，刘正洪沉着对待，用开玩笑的坦然态度应付过去了。

通过这场斗争，引起同学不同反应，特别是在进步同学中，为我们发展组织找到了初步目标。

3. 参加中山公园音乐堂事件的斗争。

1946年春，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公然以伪选代替民选，企图包办“国大”代表的选举。中共北平“学委”为了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假和平真内战的伎俩，决定于4月21日下午，通过“北平市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群众大会。刘正洪带领同学参加这一活动。会议刚开始，混进会场的国民党特务打手即骚动捣乱，狂呼乱叫，他们向主席台乱扔石头和臭鸡蛋，打伤陈瑾昆教授，并窜上讲台撕毁孙中山挂像。当时地下党除了指挥一部分进步群众阻挡窜到台上殴打陈教授的特务打手外，刘正洪则跟随石甦把大会主席台上

方的横幅抢夺了下来。通过音乐堂流血事件，使同学开始看清了国民党反人民、假民主的真面目。后来，何国模根据地下党的部署，曾多次带梁新国、陆孝平等部分进步同学到师大听取民主教授刘清扬、张东荪、张申府、曾昭伦等人的演讲会，使更多的同学开阔了眼界，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认识。

4. 罢课斗争。

师大附中向来以学生安心读书，“守规矩”著称，但在1946年上半年顾毅然所在的高一（2）班，发生了一起罢课事件，这在师大附中历史上是罕见的。缘由是一个新来的地理教师袁某，在课堂上炫耀自己是国民党员，经常散布反苏、反共言论，激起了同学们的反感。一次，他在讲课时公然说“地球自转是自东向西”，（应为自西向东）同学们听了大哗。顾毅然和进步同学抓住他讲课失误，以误人子弟为借口，串连罢课，全班同学采取了一致行动。第二次上地理课的铃声响后，全班同学都齐坐在操场的墙根下，唱“团结就是力量”，无一人进教室。此事立即受到校方训导处的追查。训导主任肖佩荪亲自出马，在班上逐个点名追查带头人，他点一个人的名字，全班同学都站起来，他无奈，改为叫个别学生去审问，也无结果。这件事由于全班同学团结一致，使训导主任追查不出结果，校方只好给全班集体记大过一次。不久，这个国民党教员被轰走了，这场斗争再一次在校内引起震动，团结教育了进步同学，为发展进步力量打下了基础。

（二）师大附中地下党支部建立后，配合全市的反美反蒋学生运动，进一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斗争。

1. 在校外建立据点，开展社团活动。

进步社团是团结进步同学，进行斗争，开展学运的最好形式。但师大附中历届校方统治很严，禁止成立学生自治会，不

准学生成立各种社团，还三令五申严禁学生参加社会上的反美反蒋学生运动。但是不管学校怎样压制进步活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必然要影响到校内。师大附中地下党支部根据学校特点，想方设法绕过学校的监控，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多种形式的活动，团结和发展进步力量。

地下党曾利用壁报形式作为团结教育同学的阵地。地下党员刘正洪、何国模决定在本班办壁报的基础上，在校园内办壁报。何国模与高三学生张荃、赵宗勳等联合办了《细流》壁报，张贴在学校中心布告栏内，但壁报贴出的当天就被三青团学生撕掉。当时的校长、国民党骨干分子李滋九即把张荃与何国模叫去训斥，并禁止再出刊，《细流》壁报因而夭折。

1948年，地下党员顾毅然也曾把揭露师大女附中校方限制学生去清华大学参加进步活动内容的壁报在校内张贴，惹怒学校当局，顾毅然同样遭到训斥。面对学校当局的严密控制，地下党又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形式。他们适当吸收校外一些进步同学和本校同学一起在校外组织社团，开展活动，以促进和带动师大附中进步力量的增长。

1946年暑假，由刘正洪组织领导，何国模协助，在校外组织了“群青话剧团”，每周利用师大的教室活动一次。当时男附中参加的有：刘伯元、唐家宝等六七位同学，并吸收师大女附中几位进步和中间同学，有石育英、高世礼、姜文、于芷薇等。同时，也有意识地吸收了男附中的个别思想后进、政治社会关系复杂的同学参加，以冲淡剧团的政治色彩。剧团通过排练进步剧目，达到团结教育同学，发展进步力量的作用。

1947年第二学期末，“群青话剧团”在师大男附中欢送毕业生大会上，演出了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内容的活报剧《夜歌》。那天全校教职员和学生都参加了，演出十分

成功。这次演出配合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

2. 参加保卫华北学联的斗争。

1947年3月底，国民党政府为镇压学生运动，北平警备司令部下令“查禁”华北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并扬言要逮捕“学联”主席柯在铎，于是华北地区各校纷纷开展“保卫华北学联”活动，并发动罢课。地下党领导了“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这场斗争与平津各院校教职员工的罢教、罢课、罢工的斗争联成一体，互相呼应，形成“四月风暴”，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北京大学沙滩召开的保卫“华北学联”营火晚会上，民主广场周围布满了国民党军队，特务分子混迹其间，寻衅滋事，恶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但与会的同学一边大唱革命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一边听“学联”负责人揭露国民党反动嘴脸的演讲，气氛热烈，直到深夜才散。师大附中地下党领导进步同学曹祺等十余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3. 参加“反漏题”斗争。

1947年暑假前夕，由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名牌大学地下党领导的反美反蒋斗争声势愈来愈大，这些大学有“小解放区”之称，国民党当局为了改变在这几所大学内的局面，除了采取镇压、迫害等手段外，还妄图利用大学统一招生的机会，让大批国民党、三青团分子混到大学去。因此，国民党青年部部长陈雪屏向报考北大、清华、南开大学的国民党、三青团分子事先泄露了考试题，以期达到使他们能混进这些大学的目的。

中共北平“学委”获悉上述情报后，发起“反漏题”斗争。师大附中地下党支部决定由地下党员何国模以毕业班学生会主席身份代表师大附中，与汇文中学联系，并联合贝满中学及部分大学的同学，一同找到三所大学联合招生委员会负责人

郑天挺，同时，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呼吁他们报导这一事件，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阴谋。

4. 带动同学参加北大进步社团组织的“补习班”、“联合会”等活动，巩固发展校内进步力量。

随着中共地下党力量的不断加强和校外斗争形势的蓬勃发展，地下党带动同学到校外参加各项学运斗争活动，人数也越来越多。1947年下半年，地下党员顾毅然等带领二三十名同学参加北大四院的“补习班”，并多次观看大学社团演出的进步话剧，到北大参加营火晚会等活动。1948年地下党员罗三都又带领王志澄等人到北大参加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社团办的“补习班”，学唱解放区歌曲，参加大学进步学生组织的联欢会与营火晚会等。同时，又借助师大学运斗争的优势，请师大社团积极分子王存华、李德纯等到校内开展歌咏与舞蹈教练活动。这项活动每周一次，仅高一年级就有四五十人参加。下午课后，师大同学即来校教大家唱进步歌曲，如《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有个好地方》、《大生产》、《二月里来好春光》等，同时还教跳民族舞蹈。有一次，地下党员数学教师吴鸿迈也予默契配合，提前下课，让顾毅然、李春山、耿稚兴等在教室内带领同学排练民族舞蹈。通过上述活动，冲击了校内政治上死气沉沉的局面，极大地活跃了同学中的民主气氛。参加上述活动的同学中，不少人参加了“民联”，有的后来入了党。这样，还带动和影响了初中年级的同学。1947年初中二年级参加“民联”的肖俊林（高中时入党）在北大沙滩“铁流合唱团”学唱革命歌曲时，发现同年级同学赵明勇、高奉仁也在练歌。通过交谈和参加活动，彼此了解日深，1947年10月肖俊林介绍他们参加“民联”，后又介绍另一班一位功课好、家境贫寒、表现进步的同学薛克宗参加“民联”（1948年10月

党)。他们组成了“读书会”，并定期在赵明勇家活动。赵明勇的父亲当时是国民党华北联勤总部第五补给区副司令，后争取到他为我党工作（解放后，赵明勇的父亲赵龙韬曾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在地下党领导下，肖俊林组织的读书会利用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住处（即联勤总部后院）为据点，每两周活动一次，阅读讨论的不仅有《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等进步文艺书籍，而且还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刘少奇的《论党》等论著也在这里传阅。这个读书会不断扩大，又吸收同学王昭铤、刘炳树等多人参加，他们还带动更多的同学参加北大民主广场的营火晚会与清华大学的大联欢活动，以及北大民主广场的千人黄河大合唱活动。

5. 声援师大“四九”血案及参加支持东北流亡学生“反剿民，要活命”大游行。

随着全国斗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进行垂死挣扎，1948年4月9日，国民党在师大制造了“四九血案”。师大男附中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了声援活动。

国民党当局极为恼恨师大地下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日益发展壮大，1948年4月9日凌晨，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派军警，勾结师大校内的反动党团分子、特务学生包围了师范大学本院、冲进校园、殴打进步学生，致使数人被打伤。他们从宿舍中逮捕了于民等11名进步学生。天亮以后，反动军警依旧包围着师范大学，师大同学群情激愤，一致起来反抗国民党迫害学生。学生们布置了自我保护的警戒线，并在师大校门外张贴海报，展示被特务打伤学生的血衣，强烈抗议国民党迫害学生的罪行，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支援师大学生的抗暴活动。面对这种形势，师大附中校方命令紧闭学校大门。训导主任张

道生（国民党员）召集全校学生在操场上开大会训话，明令禁止学生外出，并声色俱厉地警告说：“哪个学生出去支援，学校一定严加处分。”

由于校方关闭了校门，同学们只能忿忿不平地爬墙头观察。高三（2）班进步同学耿稚兴设法离开附中跑到北大四院，向进步社团“风雨社”的谢惠娥报信，呼吁支援师大受迫害同学。北大同学闻讯后，立刻设法支援师大被迫害的同学。随后，全市大学学生罢课支援师大。

经过师大同学的斗争以及其他大学的声援，当天晚上，于民等人被营救出来。次日，附中地下党员带领部分同学去师大慰问被迫害同学，还参加了师大同学组织的抗议国民党迫害学生的声援晚会。地下党员顾毅然带领耿稚兴、曹祺等十余名高三同学，罗三都带领王志诚等部分高二同学，分别参加了声援师大的活动。

1948年7月国民党在北平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杀害东北流亡学生的“七五惨案”。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命令208师装甲车队，开枪镇压抗议北平参议会停发东北学生会费和实行军训决定的数千东北流亡学生游行队伍，当场打死17人，打伤百余人，逮捕数人，制造了“七五”惨案。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师大附中地下党员罗三都避开学校当局的监控，带领王志澄等进步同学参加各大学组织的支援东北流亡学生的“反剿民要活命”大游行。尽管国民党军队将坦克炮口对准学生队伍，他们不畏强暴，要求偿还血债。“七五”惨案再一次教育同学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面目。

6. 成立护校委员会，迎接北平解放。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已龟缩到城内，傅作义困守城内。

当时地下党根据上级指示要做两手准备：一是和平解决，二是武力解决问题。因此，要做好准备，护厂护校，保护公物财产，使古城北平完整地回归人民手中。

地下党员薛克宗根据上级指示，把温景崑找到学校后院，向他传达了城工部部长刘仁的指示：“要组织护校，要为建立一个新的师大附中做准备。”并说：地下党领导决定由对师生关系较熟悉的温景崑出面组织护校委员会。

经过各班讨论，推选出主要是“民联”盟员组成的护校委员会，主任是温景崑。

温景崑找到当时的校长李滋九，向他讲清形势，希望他协助做好护校工作。在大军压境下，李滋九默认了护校委员会的公开存在，并表示他会关照总务处与职工做好学校的应变工作。随后，护校委员会的名单张贴于办公楼布告栏，地下党领导的“民联”以此名义公开展开了以下活动：

(1) 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当时，国民党、特务分子在城内搞破坏、暗杀、造谣等反革命活动，企图在市民中造成混乱。针对这一情况，师大附中地下党和“民联”组织散发了大量的宣传品，如《北平市军管会告北平市人民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约法八章》、《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等。

地下党交给师大附中的这些印刷品虽有数百份，但仍嫌不够。于是组织同学刻钢板，以“护校委员会”的名义，公开使用校方的油印机，增印数百份，在校内外以及一些国民党机关等处进行投放张贴。

(2) 抵制国民党军队强行进占学校的斗争。

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国民党军队惧怕被歼，全部撤入北平城内，他们强行占据学校、公共设施，甚至民宅。国民

党石友三的军队要占据师大附中。地下党决定由护校委员会找当时校长李滋九交涉，要求国民党军不得占用全校，以操场围墙为界，只许他们占用操场与西北角的生物实验室与劳作教室。

护校委员会组织与安排“民联”盟员和同学们巡逻与站岗，看守教室区与操场间的大门，阻止国民党兵闯入。当时操场上停放数辆国民党军的美式十轮大卡车，“民联”盟员王志澄等曾将卡车上的反光镜拆走，还松动并取走一些引擎上的螺丝，以示学生对他们的愤恨。

（3）组织同学护校。

动员和安排住在校外西城成坊街学生宿舍的二三十名同学迁入校内，住在教室里，组成护校的实际力量。

住校的“民联”盟员起了骨干作用，他们组织同学阅读革命书籍，“民联”盟员刘炳树指挥与教唱解放区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使同学们斗志昂扬。教室由于缺煤烧不暖，围城造成口粮紧张，护校委员会安排同学用玉米磨面等，使大家感到了温暖。住在校外的“民联”盟员，也每天到校值班。

（4）保护学校财产。

组织“民联”盟员帮助理化实验室老师刘惟一与工友们将被占生物实验室仪器设备等装箱，送至学校安全地方妥为保管。图书馆也是护校工作的重点，那里有藏书数万册，有些是较为珍贵的书籍。在那里安排好防火器材，清理了消防水道等。

在进行上述工作的同时，地下党员罗三都、薛克宗还按武力解决的要求，做好解放军攻城的接应、带路等配合工作，每人发给红布一块，以备作为城内激战时的识别标志。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接受改编，1月31日正式宣告北

平和平解放，喜讯传来全校师生欢欣鼓舞。上级通知“师大附中护校委员会”更名为“迎接解放委员会”，随后又改为“庆祝解放委员会”。

在此后的迎接解放军入城及建立学校党总支、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各项工作中，地下党员和“民联”盟员都起了骨干作用。

北平解放后不几天，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来校察看。刘仁见到他所熟悉的教室、图书馆，那只高高悬挂的校钟和供水的小茶炉，这些都依然如故，他深情地在校园里徘徊良久（刘仁，原名段永鹑，1924年就读于师大附中）。

一个新的师大附中，一定要保持优良的革命传统，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栋梁之材。

注释：

选自《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中学工作委员会 中小学教员工作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出版。

为本文提供材料的有：刘正洪、何国模、顾毅然、耿稚兴、曹祺、薛克宗、肖俊林、温景崑、王志澄、王昭钺、刘炳森等。

曾先后由杨伯箴、薛成业组织上述有关人进行座谈。本文先由顾毅然写初稿，后统稿与执笔为温景崑，最后定稿为刘正洪、何国模、顾毅然。

刘正洪 47届校友。1943年在师大附中组织“中青读书会”，成为附中地下党第一届党支部成员。曾任北京市友谊服务总公司副总经理，现离休。

顾毅然 48届校友。曾任天津市科学技术学会副主席，现离休。

温景崑 51届校友。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科技教研室主任，现离休。

难忘的岁月

王志澄

1945年春天，我在师大附中读初二，北京上空出现美国B-29重型轰炸机，在万米高空缓慢爬行，后面拉出一条银白色的飞行云。夏天，日本投降了。大家盼望新生活的来临。然而，好景不长，盼来的却是美国吉普车的横冲直撞。接着便是内战又起，经济滑坡，物价上涨，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946年暑假，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蒋介石军事失利，经济危机引起教育危机，不少教师和学生面临失业和失学的危险。平津学联发起助学运动。由于同乡关系，我结识了罗三都同志，他是师大附中最早的地下党员之一。在他的影响下，我与班上部分同学议定，以学生会合法形式，展开了助学活动。动员享受公费的同学，自愿定期拿出自己的部分公费，资助贫困同学。师大附中学生以埋头读书、好学上进著称于世，这时又能发扬团结互助的友爱精神，使我十分感动，至今念念不忘。

1947年，物价大幅上扬，民不聊生。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发动战争，镇压民主，激发了人民的反抗。特别是青年学生频频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这年夏天开始，我与罗三都单线联系下，参加了“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各项活动。我记得那段时间里，参加过两次较大的示威游行。一次“反饥

饿、反内战”游行。队伍经过当时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官邸时，国民党宪兵围追，坦克前堵后截，如临大敌。另一次是支援东北流亡同学“反剿民、要活命”大游行。这次游行是在东北流亡学生抗议北平参议会停发会费、实行军训、请愿时被打死十七人，打伤百余人后举行的。两次游行，我均被指派为纠察人员。

参加“爱国民主学生运动”，作为中学生，当时主要工作是利用寒暑假，组织进步学生参加“学习班”、“读书会”。通过读书和学习，认识和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解放区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反民主、反人民的本质，提高认识和觉悟，做些力所能及的准备工作，迎接解放。

通过读书会，在同学中传阅进步书刊和宣传品。像《西行漫记》、《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外包上旧小说书皮，伪装起来。也有苏联小说《士敏土》、《高尔基三部曲》、《铁流》。中国小说《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从中看到了创造新社会的希望和远景。

那两年，也和校内外同学一起，参加过清华、北大学生会组织的“暑期补习班”。班上除少量的进步演讲外，大部分时间是进步青年的集体联欢和户外活动。活动多半在北大校园内，在钓鱼台（现在玉渊潭公园）的小山上。大家拉起手跳集体舞，放开喉咙唱欢快的歌：“山那边有个好地方”、“解放区的天”、“二月里来好风光”、“大生产”、“团结就是力量”、“黄水谣”、“大路歌”……

通过这些前所未有的活动，使我发现在沉闷的学习环境外，另有一个新天地，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个人的前途……美好的日子不会太远，但要通过斗争得来。

凭着青年人的热情，有时也甘冒风险，做一些自认为有益